

“说”和“Speak, Say”的词义对比分析研究

——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

陈怡雯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4日

摘要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 探讨了汉语中“说”和英语中“说”类动词“speak”和“say”的词义对比分析。文章首先介绍了隐喻和转喻理论, 作为人类认知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 并探讨了它们在语言表达中的运用。本文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中“说”的原型词义及其扩展语义的比较, 揭示了两种语言在表达相同概念时所展现出的不同特点。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汉语和英语中独有的扩展词义, 展示了两种语言如何通过隐喻和转喻实现词义的扩展。最后, 文章总结了汉语和英语在词义扩展上的异同, 并提出理解这些差异对于二语学习者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

词义对比, 认知, 隐(转)喻, 思维方式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Shuo” and “Speak, Sa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Yiwen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rch 5, 2026; accepted: March 31, 2026; published: April 14,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Shuo” in Chinese and its English counterparts “speak” and “s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t begins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ie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as fundamental cognitive processes for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ua-

lization, discussing their application in language expression. By comparing the prototype meanings and extended semantics of the Chinese verb “Shuo” and its English equivalen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languages in expressing similar concepts.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unique extended meanings found exclusively in Chinese or English, demonstrating how these languages achieve semantic extension through metaphor and metonymy.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concerning semantic extension, suggesting that understanding these differences hold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Keywords

Semantic Contrast, Cognitive, Metaphor (Metonymy), Thinking Patter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根据 Evans 的定义, 认知语言学是一种研究语言、思维和社会文化经验的跨学科方法, 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认知语言学的特点是在语言研究中致力于意义和形式的不可分割性[1]。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 人类的认知是处于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层次。语言并不直接反映客观世界, 而是反映了人类理解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长期以来, 汉英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其背后反映的汉语使用者与英语使用者的思维差异一直是众多学者专家的研究兴趣所在。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来,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在面对和认识现实世界时往往基于不同的客观经验。而在 Lakoff 和 Johnson 看来, “经验”是一切活动的基础, 以经验基础为前提的认知推理构成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的能力[2]。因此, 尽管面对的是同一事物, 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认知表现, 而反映两个民族认知结构的汉语和英语自然差异尽显。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词典中与动词“说”有关的 8 个词语的基本词义, 基于认知语言学中隐(转)喻和原则性多义词分析法的理论依据, 旨在通过结合语料库统计对比与分析典型例句, 对汉语动词“说”与英语动词“speak, say”的对比分析, 探讨在英汉词义演化中两种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扩展过程。

2. 隐喻与转喻理论

隐喻和转喻是人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的基石, 它们构成了我们思维的基本模式。在人类的语言表达中, 隐喻和转喻的使用极为普遍, 它们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语言, 更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洞察和理解。通过这些修辞手法, 我们能够以形象和生动的方式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感知。关于隐喻和转喻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 隐喻的认知特性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隐喻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 发表了众多专著, 包括 Lakoff 和 Johnson、Lakoff 和 Turner、Fauconnier、Fauconnier 和 Furner 以及束定芳的重要作品[2]-[6]。Lakoff 和 Johnson 在他们的研究中, 以及 Lakoff 在其自己单独的工作中, 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概念物化作为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 它在抽象概念的形成中扮演着核心角色[2] [7]。他们主张, 我们对身体和周遭物质世界的感知是我们理解抽象概念的基础。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体验使我们能够将非物质的元素, 比如事件、行为、情感和思想, 通过一种隐喻性的方式, 视为具有物理属性的存在, 这种隐喻被称为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s)。“通过实体隐喻的机制,我们可以对抽象的实体进行指称、范畴化、组合、量化,从而进行推理。”[8]然而,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学者们对转喻的关注相较于隐喻较少,这也导致了转喻的研究成果较少。从认知角度研究转喻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者 Lakoff 和 Johnson,他们首次将转喻描述为一个认知过程[2]。自20世纪90年代起,认知语言学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焦点转向转喻现象,他们认为转喻不仅是一个概念现象,也是一种认知过程[9][10]。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陆续发表,这些作品进一步强调了转喻在认知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转喻的重要性可能超过了隐喻[11]-[13]。虽然关于转喻的研究成果较少,但基于其基础性地位,很多学者将隐喻和转喻置于同等地位并结合起来研究,探讨某些值得关注的语言现象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根据 Lakoff & Johnson 的观点,隐喻是一种通过相似性连接源领域和目标领域的映射过程[2]。而从结构上看,隐喻的结构由本体、喻体和喻底三者构成基本框架。隐喻通过识别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一个概念的属性或特征映射到另一个概念上。它通过意义的迁移和词汇含义的演变,允许我们用一事物来解释和体验另一事物,进而促进了人们的理解与日常沟通。转喻是一种概念映射,是人们自发地、无意识地利用两事物相邻的常规关系的认知过程[3]。而根据赵艳芳的观点,转喻是一种认知现象,它发生在两个相邻或有关联的领域之间[14]。通过强调两个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和物理上的联系,转喻允许我们用一显著的特征来代表另一个特征,从而帮助我们基于这两个事物间的关系来构建对该事物的概念理解。在转喻中,往往用具体且相关的事物来代表抽象的概念,这是因为人类倾向于对那些接近或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联想。通过这种联想,我们能够理解客观世界,同时,这些联想也在我们的认知结构中构建了事物间普遍关系的框架。总之,基于人类认知经验的隐喻和转喻的使用,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更加丰富生动且容易被人们感知和理解,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理解。隐喻和转喻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两大机制,被广泛运用于词义扩展研究中,而近十年来运用隐喻与转喻的复合机制来对中英文构词词义进行对比的研究更是经历了蓬勃发展。卢卫中在《英汉语构词理据》中提出,隐喻和转喻并非两种独立运作的机制,而是与识解理论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英汉构词的理论依据[15]。芦晓莉、刘宇红对汉语与英语中的隐转喻习语进行了系统对比,发现隐喻与转喻的互动在习语理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聚焦、突显等识解方式对该种习语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16]。司建国以《红楼梦》中文文本以及霍克斯的英译本作为语料,对比了两种语言中言辞行为的转隐喻表达,发现汉语中存在大量以人身体部位构建的转隐喻表达,而英语则以“tongue”的使用频率最高,折射出汉语表达宽泛、英语表达精准的特征[17]。在此基础上,汉英词义扩展研究发展到了运用认知理论解释的阶段。比如,李智涛、廖美珍通过对英汉致使运动事件构式的研究,发现汉语更多采用泛意动词辅以连动结构进行表意,而英语则倾向于使用一个精准的动词进行表达[18]。

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以隐转喻互动理论为框架,对汉语“说”与英语“speak, say”进行词义扩展对比研究,旨在揭示汉英两种语言在言语动词使用上的共性与差异。文章中的语料和例句主要来源于多个权威词典及语料库。除了部分内容来自 BBC 语料库和 CCL 语料库外,还包括以下资源:《新华汉语词典》(最新修订版大字本,2014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七版),《汉字解形释义字典》(华语教学出版社),《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第八版,2014年),《A New Century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外研社,2009年),以及《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NECD,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本文的语料基础。

3. 汉语“说”与英语“Speak, Say”的原型词义

在汉语中,“说”一共有三个读音,包括[shuō]、[shuì]和[yuè]。由于当读音为[yuè]时,“说”同“悦”,这里为了和英语中的“speak, say”对应,就只讨论读音为[shuō]和[shuì]的“说”。通过查阅《新华汉语

词典》，当读音为[shuō]时，“说”一共有 5 种释义，均是动词和动词词组的释义；当读音为[shuì]时，“说”只有一种释义，表示“用话劝说别人，使他听从自己的意见”。《现代汉语词典》对“说”，读音为[shuō]时，共列出了 6 种释义；而读音为[shuì]时，也只有一种释义，和《新华汉语词典》一样。《A New Century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将“说”一共分为 7 种释义，包括 6 种动词释义和相关搭配，以及 1 种名词释义，和汉语“说”意义对应的英语单词主要有以下三个：speak、say 和 tell。此外，还有一些在特定语境下表示延伸意义的动词，例如：explain、criticize、mean、indicate、perform。而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查找汉字“说”，出现的英文单词条目包括 loquitur、quoth、theory、speak、say、said 和 tell。根据使用的频率和熟悉程度，在本文中我们选取“speak、say”进行分析。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所拥有的客观经验不同，认知世界的方式也不同，导致两个群体即使在描述同一事物时，语言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汉语中“说”与英语中类似的表达并非意义完全一一对应，其中的差异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也为以汉语/英语作为二语的二语学习者提供帮助，减少不必要的错误。

通过对汉语词典、英语词典、汉英双语词典以及 BBC、CCL 两个语料库的统计对比发现，无论是汉语中的“说”还是英语中的“speak, say”都以“诉说，用言语来传达信息、表达意思”作为第一核心要义。对这个动作进行分析，可发现它具有以下特点：施事是确定的、具体的，且一般是人作为主体；以向外界传递信息为目的；不一定存在受事，即不一定有信息的接收者。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经验为“说”这一范畴确定一个基础的语义范畴：施事通过各种声音器官发出有意义的声音、形成言语，向外界传递信息的过程。例如：

(1) 肯尼迪说：“各公司正创造自己的基础框架和自己的 API，并希望将来能与其它的对象技术互操作”。(CCL 语料库)

(2) 专家们说，TCO 也揭示了间接 IT 成本，如支持、培训和重组等。

(3) She refused to speak about the incident.

(4) I need to speak with her this minute.

(5) I'd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6) He said the fund stood at 100,000 pounds.

4. 汉语中“说”和英语中类“说”的表达“Speak、Say”的拓展语义

4.1. 汉语和英语相同的扩展词义

隐喻和转喻是认知语言学领域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隐喻和隐喻映射，是基于经验的推理过程，它们通过相似性来解释一个概念。这种过程不仅涉及根据对具体事物的认知模式来构建对其他事物的认知模式，而且涉及到将整个认知模式的结构和内在关系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这种转移被称为源领域向目标领域的结构映射，是经验和理解的产物。认知推理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这是隐喻映射的核心机制。与概念隐喻以事物间的相似性为基础不同，突显性是转喻映射的基本特征，即通过将一个事物的显著特征或属性用来象征性地代表另一个事物的本质或核心。例如在文学作品中，“剑”经常被用来转喻“勇气”。因此，当一位作家描述一个角色为“拔出了他的剑”，这可能意味着这个角色正在展示他的勇气和决心，而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拔剑动作。人们倾向于将相似或有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并利用这种联系来理解外部世界。这种联系在我们的思维模式中构建了一种框架，用以识别和理解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转喻的产生正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认知特性上，往往用具体的事物来指代比它所指范畴更大、更抽象的事物。转喻的现实基础在于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或空间上的相邻性。在转喻中，被比喻的事物(本体)与用来比喻的事物(喻体)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相似之处，但它们往往在功能或位置上相互接近。

这种相邻性揭示了它们之间紧密且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诉说”的原型词义到有“解释”、“责备”、“主张”等拓展词义，就是隐喻和转喻的结果。

(7) I speak the truth.

(8) 他说英国话带着浓重的中国口音，而说中国话又带几分洋腔调。

(9) My mother spoke Russian.

(10) 有一个名叫佛瑞德·杜威的淘金者，他给回家的朋友们写信说，他用了两周的时间才把补给从斯卡格威运到了山脚下，他在信中写到，他的身体受到了伤害，因为搬运这些补给实在是太难了。

(11) Auntie Winnie wrote back saying Mam wasn't well enough to write...

(12) 爸爸说了他几句。

(13) She tried to speak to Seb about his drinking.

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与“说”的原型词义“诉说”相比，它的扩展词义变得更加丰富，包括了“表明”、“说(某种语言)”、“解释”以及“责备、批评”的含义。“诉说”的对象一般指向人，而“表明”指向的对象范围则更加广泛，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或某种现象，并且更加强调结果的明确性和可见性。“诉说”往往带有较强的情感色彩，可能涉及个人的感受、经历或故事。“表明”则相对中性，可以是客观的陈述，也可以是主观的态度表达。然而，“诉说”和“表明”都涉及到将某种信息或情感传达给他人，基于这点相似之处，“诉说”的含义出现了泛化，扩展到了指向对象更宽泛、感情色彩范畴也更大的领域。“说某种语言”与“诉说”的原型词义有动作上的相似性，可以看作是由“宽泛的动作过程”映射到“相对具体的动作过程”。这里的“说”通过隐喻的方式扩展了其意义，不再仅限于用母语表达，而是泛指使用任何一种语言进行表达。语言被隐喻为一种工具或媒介，而“说”则是通过这种工具进行交流的行为。“诉说”的原型词义通过转喻拓展为“解释”。“解释”不仅仅是说出某些话，而是将这些话与更深层次的含义或理解联系起来。这种扩展涉及到将“说”的直接交流属性隐喻为一种更深层次的交流，即不仅要传达信息，还要确保信息被理解。这里的“说”被隐喻为一种更复杂的交流行为，它涉及到对信息的深入阐述和澄清。而在例句(12)和(13)中，“说”通过转喻的方式获得了新的意义。原本“诉说”只是表达言语的行为，但通过转喻产生了扩展词义“责备”。“说”转喻为表达不满或批评的行为。这里，“说”被用来指代整个责备的行为，包括说话的内容和情感。

4.2. 汉语和英语不同的扩展词义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不仅为日常交流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更是推动语言发展和词义演变的强大动力。汉语中的“说”和英语中的“speak、say”虽然在字面上都与言语表达有关，但通过隐喻的桥梁，它们各自衍生出了独特的扩展词义，这些词义在不同文化和语境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下面将分别对汉语中和英语中独有的扩展词义进行举例分析说明。

4.2.1. 汉语中独有的词义扩展

(14) 她只有两个女儿，已亲眼看着她们嫁给了体面人家，于是现今闲着无事可做，只好给人家说亲。

(15) 传统的中国婚礼仪式包括6个必备步骤，它们是：说媒、定亲、聘礼、迎娶、拜堂(三鞠躬)、喝交杯酒等六步。

(16) 这时张生赶到，真相大白，又经白马将军说合，张生与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

(17) 他们正说着集资办厂的事。

(18) 通过参加英国投资贸易总署代表团巡防，英国企业不但赢得直接向当地政府游说的优势，同时还因为有英

国政府出面而赢得中国政府的肯定。

(19) 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4.2.2. 英语中独有的词义扩展

(20) The first attack on Mr. Black came moments before he was due to speak.

(21) He was determined to speak at the Democratic convention.

(22) The clock spoke.

(23) The *Act* says such behavior is an offense.

(24) All I can say for him is that he is a better writer than some.

(25) The padre finished saying the *Nunc Dimittis*.

(26) Let's say we pay five thousand pounds in the first year.

(27) The form might include, say, a dozen questions.

(28) Say, did you notice any blood?

(29) The voters are entitled to have their say on the treaty.

(30) The assessor will have a say in how the money is spent.

(31) The clock says ten past two.

通过上面的例句，我们可以得知汉语中的“说”除了“诉说”的原型词义以外，还有“说合、介绍、商量、商讨、游说”的扩展词义，这是汉语中独有的。而通过分析英语的几个例句，可以看出 *speak* 还有“发言、演讲、发出独特的声音(如钟响)”的扩展词义，而 *say* 有“(文章、标题等)表示、传达、替(某人或某事)说好话(坏话)、背诵、假设、比如说、哎呀(喂)、发言权、决定权、(钟表)指示(时间)”这些扩展词义，这些是英语中独有的。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随着语境的变化，词语含义的内涵和外延都会发生相应的扩展和变化。这种扩展实际上是一个从共同的源域向不同的目标域投射的过程。然而，由于中英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上存在差异，这种投射在两种语言中所指向的目标域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从汉语独有的扩展词义来看，从“诉说”的原型词义到“说合”的扩展词义，“说”的含义通过隐喻表示为通过语言来促成或调解关系。这里的“说”不仅仅是表达，更是一种影响他人行为或关系的能力。而当“说”表示“介绍”的含义时，“说”字隐喻性地表示为将某人或某物的信息传递给他人，相当于将信息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传达信息的范畴得到了延伸。在例句(18)中，“说”表示“商量、商讨”的意思，“说”由纯粹的单人言语行为投射到多人的言语行为并带有强烈的结果含义。在这里，“说”字通过转喻表示为讨论的过程，即通过语言的交流来达成共识或决策。在例句(19)和(20)中，“说”是“说服”、“游说”，“说”字转喻性地表示为影响他人观点或决策的过程，即通过语言来改变他人的想法或信念。

由于思维方式不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经验也有所差异，因此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在词义的隐喻和转喻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英语中，同样表示“说”的“*speak*、*say*”除了其“说话”的基本词义此外，也产生了很多英语中独特的扩展词义。当 *speak* 表示“演讲”时，其源域“说话”通过隐喻映射到了更正式、有组织的发言形式，目标域是“在公众场合的正式发言”。在例句(23)中，“*speak*”的施事拓展到了不仅限于人的动作主体，源域是“用语言表达”，目标域是“产生声音”。这里，“*speak*”通过转喻扩展到任何能够发出声音的实体，不限于人类。*say* 的基本词义是“说”，即表达或陈述某事。当表示“传达”时，源域是“说”，目标域是“通过非语言方式表达”。这里，*say* 通过隐喻扩展到文章、

标题等非人为主体的非口头的表达方式。当 say 表示“替(某人或某事)说好话(坏话)”时,目标域是“代表他人表达观点”。say 通过转喻扩展到代表他人发言的行为。扩展词义为“背诵”,目标域是“重复已知的文本”。say 通过隐喻扩展到记忆并复述文本的行为。当 say 有“假设”的含义时,目标域是“提出假设或条件”。这里, say 通过隐喻扩展到逻辑或推理中的假设行为。表示“比如说”时,目标域是“提供例子”。say 通过转喻扩展到引入示例的语境。say 还可以表示语气词“哎呀(喂)”,目标域是“表达惊讶或引起注意”。say 通过转喻扩展到非正式的、情感化的表达。say 作名词时有“发言权、决定权”的意思,目标域是“拥有表达或决策的能力”。say 通过隐喻扩展到权力或能力的语境。在例句(32)中, say 表示“(钟表)指示(时间)”,目标域是“显示或告知信息”。say 通过转喻扩展到任何能够提供信息的实体,如钟表。

5. 汉语“说”和英语“说”类词一对多的原因

由以上分析可知,汉语和英语在表达“说”的含义时,存在一对多的现象;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说”除了“诉说”、“用言语表达”的原型词义外,还通过隐喻、转喻的实现增加了许多扩展词义,但汉语和英语的扩展词义并不完全相同。这折射出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悟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内在的理解和洞察力。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倾向于通过“内悟”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以及通过“外悟”来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这种思维模式倡导“修身养性”和“绝圣弃智”,即通过自我修养来达到智慧的境界,而不是单纯依赖外在的知识或逻辑推理。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更倾向于“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强调逻辑推理和证据支持。在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汉语和英语在表达相同的语义时也会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从汉语中的“说”来看,“说”在不同的语境下会延伸出许多不同的语义,而译成英语时,我们会发现英语动词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例如,说明——explain,说明——persuade,说媒——act as matchmaker。这种翻译中出现的“一对多”的现象是由于汉语使用者的悟性思维具有整体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它强调对事物的全面把握和深层次的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或具体细节上。这种思维方式在语言表达上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抽象和含蓄的词汇,以传达更丰富的内涵。因此,汉语中多见一词多义的现象,也符合语言中的经济原则。而英语使用者重视理性,倾向于使用具体、明确和分析性的语言表达。在英语中,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对词汇的精确选择和使用上,每个词汇都有其明确的定义和使用范围,以确保表达的准确性和逻辑性。

6. 结语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来,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在面对和认识现实世界时往往基于不同的客观经验。以认知经验为基础的概念隐喻和转喻是词义扩展的重要方式。因此,汉语和英语中普遍存在一词多义的现象。由于个体的认知经验和隐(转)喻投射方式的差异,汉语和英语在表达相同词义时展现出各自独特的表达策略。本文以汉语中的“说”和英语中的“speak、say”为例,分析了汉语和英语通过隐喻和转喻实现的词义扩展过程,其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希望能够帮助以汉语或英语为二语的二语学习者理解两种语言中词义“一对多”的现象,从而提升二语习得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 [1] Evans, V. and Green, M.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2]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 Lakoff, G. and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0986.001.0001>

-
- [4] Fauconnier, G.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74220>
- [5] Fauconnier, G. and Turner, M. (2002) *The Way We Think*. Basic Books.
- [6] 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7]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1013.001.0001>
- [8] 杨波. 概念语法隐喻的认知视角[J]. 外国语, 2013, 36(5): 27-35.
- [9] Taylor, J.R.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Clarendon.
- [10] Croft, W. (1993)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 4, 335-370. <https://doi.org/10.1515/cogl.1993.4.4.335>
- [11] Radden, G. and Kövecses, Z.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In: Panther, U. and Radden, G.,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John Benjamins, 17-59.
- [12] Haser, V. (2005) *Metaphor, Metonymy, and Experientialist Philosophy: Challenging Cognitive Semantics*. Mouto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18243>
- [13] 束定芳. 隐喻和换喻的差别和联系[J]. 外国语, 2004, 27(3): 26-34.
- [14]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5] 卢卫中. 英汉语构词理据: 基于认知语言学识解理论的对比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 50(4): 512-524.
- [16] 芦晓莉, 刘宇红. 汉英隐转喻习语对比研究——于认知语法视角[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3): 67-73.
- [17] 司建国. 汉英人体经验构成的言辞行为转隐喻对比研究: 基于《红楼梦》双语语料库[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22.
- [18] 李智涛, 廖美珍. 英汉致使运动事件构式及其动词对比研究[J]. 外国语文, 2025, 41(1): 45-53.